ChinaXiv合作期刊

古籍修复学科构建的若干思考*

■ 张美芳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目的/意义**]面对长期以来古籍修复突出实践活动、理论研究弱化、工匠式培养人才等现象，需要强化古籍修复研究，培养高素质修复人才，古籍修复学科建设是推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的内动力。[**方法/过程**]分析古籍修复的内涵和特性，明确其他学科与古籍修复的相关性。依据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构建古籍修复学科知识体系。[**结果/结论**]工匠与技术组合是古籍修复学科建设的主要范式，引入现代技术将极大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古籍 修复学科 修复理论 学科建设
分类号：G273.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10.001

chinaXiv:202308.00304v1

古籍修复按传统学科的分类，隶属于古籍保护学，与文物修复、档案修复、艺术品修复、文化遗产保护等有交叉。长期以来，古籍修复被认知为一项实践操作，与抽象的理论关系不大，从事修复工作的人群被认为是一特殊群体，属于能工巧匠。自古传承的古籍修复技术和方法相对较为成熟，但有关修复完整理论、经验、研究等缺少系统的提升和总结，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上述因素影响了工艺的推广、各级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在古籍修复领域，许多人对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抱着不屑一顾或无从下手的态度，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内容单一。"修复等同于实践活动""修复工作者等同于匠人"观念和印象带有简单、概括且固定、深刻的特性，去除这一刻板印象，需要从学科建设的层面开展研究，实现古籍修复理论及其研究从贫瘠不足到蓬勃发展再到百花齐放。

随着全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古籍、文物修复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受到社会及全民关注，古籍修复成为神圣、值得尊敬和向往的职业。为缓解修复人员短缺、高技能修复人员奇缺的现象，全国高校或部分机构计划或已经开始培养专业化修复人才，或独立或联合培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供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现在开设的古籍修复专业称谓很多，如古籍保护与修复、古籍鉴定与修复、古籍鉴赏与修复等，在部分高校纷纷建立修复专业的今天，难免摆脱以实践性技术操作为主、理论为辅的模式，类似工匠式的培养方式愈发引人深思。古籍修复在实践、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与图书馆学等学科相比，其学科建设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尚未展开，比如古籍修复基础理论的建设、学科体系的构建等，研究的纵深领域还需要开掘，学科建设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1 古籍修复学科建设的意义

古籍学科建设就是按照古籍修复的性质、专业独特性和知识的相关性，把偏实践操作、重应用、松散的、与关古籍修复相关的研究、成果、理论，建设成有学理、有专业和系统的体系，涉及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师资建设等内容。作为图书保护内容中的一部分，总结实践、梳理理论、开展系统研究已成为当下古籍修复摆脱"刻板印象"下的"标签化"认知的内动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经出现古籍修复的踪影，全国古籍保护项目等大型工程已将修复推到研究前沿。高校或很多机构在开展古籍修复的培训和高等教育，试图开辟修复大众化培养的路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的认定意味着在古籍修复领域有学科带头人。在这种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古籍修复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古籍修复以学科进行建设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由之路。

从更理性、更前瞻性的角度去认识古籍修复，它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濒危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29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美芳(ORICD:0000-0001-8252-0760)，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rdmeifang@tom.com。
收稿日期:2017-12-22 修回日期:2018-03-01 本文起止页码:5-9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ChinaXiv合作期刊

其他学科，如历史、文化、艺术、美学、材料、工艺、工程、图书、版本、计算机、生物、环境等关联性很大，怎样将众多学科中与古籍修复相关的知识、理论准确地应用到古籍修复中，使其有机、系统地为修复所用，这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各种与修复学有关的学科，都是这个系统知识与理论中的一部分，应用于不同环节中。其中包含了古籍保管、收藏、甄别与评估、修复材料分析、修复工艺的研究（对古籍本体的研究以及对载体的研究）、版本的鉴定、实施修复操作、修复技术的评估等，这些内容涉及到的知识和理论或多或少关联于修复。为完成这一活动还涉及到修复者的个人文化修养、职业道德、修复伦理和美学等，这些因素综合叠加在一起，共同履行让古籍恢复原貌、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使命。修复学的建立，将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协同配合，为文化遗产事业的整体性发展提供重要的平台。

学科建设的研究为整个学科的健康成长搭建了一个基础，从而有助于古籍修复研究共识的达成。化学、物理学、材料学等自然科学与版本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均在古籍修复学这个交叉学科上得到广泛应用，但古籍修复绝不仅仅是这些学科的叠加、套用，多学科融合、交叉，最终形成修复学独特的逻辑、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在将这些学科应用于古籍修复时，要充分考虑到各学科理论与修复结合点与面的问题，要考虑理论的系统性，又要考虑可用性，既不是全盘照搬，也不是生拉硬扯。比如修复材料学属于材料学一部分，但不能将材料学的所有材料放在修复材料学中，修复材料主要包括修复用纸、丝织品、粘合剂等。造纸学中有机制纸、手工纸，种类繁多，修复用纸主要涉及手工纸，较多使用的是皮纸和竹纸；丝织品作为修复辅料使用最多的天然绫、绢等；粘合剂在材料学中有很多种类，包括很多高分子粘合剂，但在古籍修复中应用最多的是小麦淀粉。

其他学科的技术与成果应用于古籍修复时要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古籍的特殊性也限制了某些成果在古籍修复中的应用。例如材料学中很多新型材料在其他领域可以作为成熟技术被使用，但不一定能应用于古籍修复中，要考虑到其是否对古籍安全、可靠，不能对古籍有任何影响或潜在影响，同时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逆性，保护材料的老化可能给古籍带来二次破坏。古籍检测分析时最好无损或微损，检测量是微量，要做到既不破坏古籍，又要检测准确，其他领域通用的方法可能在古籍修复时不能使用。

chinaXiv:202308.00364v1

有许多学者开展过有关古籍修复的研究，是关于修复研究之学，也就是说大多数学者从专业的角度，如从修复原则、修复材料、修复流程、修复案例等出发研究修复问题；也有的学者以修复为落脚点，用非修复专业方法、技术和理念指导本专业理论，为修复提供新血液和研究思路。上述研究范围非特定，范围广，角度多，针对不同主题或内容去研究，这种点对点或点对面的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探索理论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按照库恩学科范式的理解，这种研究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学科，成熟的学科需要一个或多个学科范式。作为一门学科，修复学科的"学"是特定的，而非任意选择内容所开展的单独研究，也不是将与之相关学科内容堆砌而成。它以古籍修复为研究对象，要全面、系统地回答学科对象的本质、规律等基本问题，研究结果不是为解决实际工作中具体问题，更注重的是全面性研究，体现高度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古籍修复想要走得更远、更快，培养的人才非工匠，而是技术、理论、素养兼备，就需要从古籍学科化建设出发，建立古籍修复学科理论体系，循序渐进地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研发新的技术方法。高涨的古籍修复事业、蜂拥而上的古籍高等教育与低落的学科建设形成鲜明的反差，急需开展对古籍修复学构建的探讨。

2 古籍修复的内涵与外延

学科建设需要建立学科关系、理论体系、工作方法、人才培养模式等[1]，因此，需要对修复学进行总体研究，包括对其概念的界定，对本质、特点、形态的归纳和分类等。在没有弄清"修复"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义的情况下，修复行为成了一种完全随意性的行为，修复活动取决于修复者本人的能力、技巧和审美意识，有时候甚至是蹩脚的和损伤性的修复。古籍修复是利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现代技术等，经过手工或设备处理，去除多余、损坏性的或不利于永久保存因素，使古籍实体或信息基本恢复其原貌的技术，修复是古籍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使用一定材料和方法，使破损古籍恢复原貌。

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需要审视和研究古籍本身实物和相关典籍，找到原建造者的出发点和原件基本特征，然后用类似创造性工作手法将损坏或已不存在但符合原件的局部或整体进行补充完善，将多余部分除去。在古籍修复实践过程中不排斥对古籍主体的干涉，强调材料的可逆性、兼容性和可辨识性。同时，有效的古籍修复不可能仅凭对古籍的内容和历史研究而

获得足够的支持,还需要一系列的技术分析与研究,现代设备、技术可以提供极其重要的手段。需要应用对比、类比的研究手段,准确选择材料,精确确定流程,科学选择方法,需要配合采用实验检测和分析,因此,实验手段是不能缺少的。

中国古籍数量大,形式多,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古籍的特点不同,修复技术也有所改变。当将古籍修复作为研究对象时,需要对修复技术的形成、发展、变迁进行探寻,描述其发展史,并把握古籍的文化内核,揭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古籍在不同社会时期的修复技术的探讨,就需要在人类历史上划出若干个断面,以这些断面为依托,进行纵向历史研究,揭示其原本的呈现。因为要了解古籍,不仅要了解它的生成、发展,还要了解它在不同时代因材料和文化的发展,修复技术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充分认识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比如,传统修复传承主要方式就是师傅带徒弟,靠口授相传,坚持可持续发展,给未来留下可工作的空间。当下,随着新技术、新材料发展,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的矛盾突出,所以修复历时与共时研究互相依存,不可偏废。从有效性上说,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模式解决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问题,为今古籍修复学科研究的基础模式。

当利用纸张、书写材料通过装订形成古籍时,它就进入了物体世界的时间历程。作为物质形式,它的历史性体现在,一是它被创造出来时的原初历史,是时代的产品,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特征;二是当下的历史。一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古籍,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流传到今天,经历了许多变化,有无数人对此作过见证,这种当下的历史性是不能抹煞的。因此,对古籍的修复就有双重的诉求:审美的和历史的,而在这两种诉求中获得平衡,就构成了修复的内涵。修复之前需通过人的直觉的确认,鉴定其历史价值和外形精美。修复以传承后代为目的,在保证古籍的原貌下,从审美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再一次确认。修复首先是从古籍的物理特性考虑,各种材料形成实体,保证其物理特征,显现古籍的艺术形象,修复的目的正是尝试恢复古籍形象上的"整体性"。一般只能修复古籍的材质,目的在于重建作品潜在的整体性,不是生成一件赝品,必须留下在历史上修复的种种痕迹。

在理解古籍修复内涵和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古籍修复实质是给古籍看病、诊断和治疗。如果古籍保护、图书保护属于预防性保护,修复就属于治理性保护,后者是在前者学科体系的基础上生成的,二者有联系,但有其独特之处。所以,应当从已有图书保护学、材料学等学科体系出发,将其研究范畴相重合的部分加以厘清,从而构建适合的古籍修复学。

3 构建古籍修复学科知识体系

建立古籍修复知识体系的目标是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修复学必须将恢复古籍原貌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材料学、历史和美学是修复核心知识体系。修复学科属于人文科学,属于交叉学科,兼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应用学科,理论体系支撑学科框架,包括学科史理论、学科指导理论、学科研究方法理论等。古籍修复学科建立需要明确三点:古籍是独特的、是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及领域;理论体系以修复理论主导,以修复材料学、版本学、历史为核心,以史学、美学等素养等构成的知识系统;特有的研究方法及学科知识构建框架。

古籍修复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古籍寿命,便于保存和利用,其中包括古籍实体修复技术和古籍信息修复技术。修复时遵循三项原则:有利于延长古籍寿命、尽量保持古籍原貌和最小干预。古籍修复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除古籍上的一切附着物和有害物质,二是修补古籍的残缺部分,其目的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防止附着有害因素继续危害古籍。修复要根据历史的真实,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动原物面貌,复原部分要求做到与其部分相仿,对每件所要求修复的古籍,都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分别处理,反对以不成熟的技术随意使用在珍贵的古籍上。在进行修复时,首先要确定原制品材料类别、性能及其损坏情况,先做好文字绘图,照相记录,然后制定修复方案,修复用料要尽可能与原物一致或相似,并尽量采用原制作方法和工序。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去污、去酸、加固、字迹的显示与恢复、修裱、装帧等。

修复知识理论体系包括[2-3]: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古籍修复材料学、图书修复史、修复工艺学、修复与文化、修复与装帧、修复与保护、修复与现代技术、修复与鉴定、修复伦理、修复环境、修复技术管理。其中,核心知识包括修复材料学、图书修复史、修复工艺学;基础理论包括: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与文化;专业基础知识包括:修复与装帧、修复与保护、修复与现代技术、修复与鉴定、修复伦理、修复环境、修复技术管理等。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古籍修复专业实践环节主要有文献典藏认识性专业实践、图书馆博物馆业务流程专业实践、古籍整理修复与古籍保护专业实践、文

chinaXiv:202308.00084v1

ChinaXiv合作期刊

物鉴定与修复经验交流性专业实践、摄影摄像专业实践、古籍整理修复与保护综合性实践等。修复实践可以按古籍类别、古籍价值等级，开展不同层次的练习。

在古籍修复学科知识体系中（见图 1）包括必不可少的核心知识、专门知识和提高专业素养的相关知识及实践操作。前两者基本明确了修复范围、领地和构成，确定了本学科的研究范围，标明、划定甚至开拓学科边界、范围和研究范式以及遵循治学的规则。相对于其他专业化实践，后两者更加显示和表明学科的自足性和独立性，由此说明学科的身份资格、对象内容、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同时也要求古籍修复学以更精细成熟的工具、工艺、方法、手段、材料对不同形式古籍修复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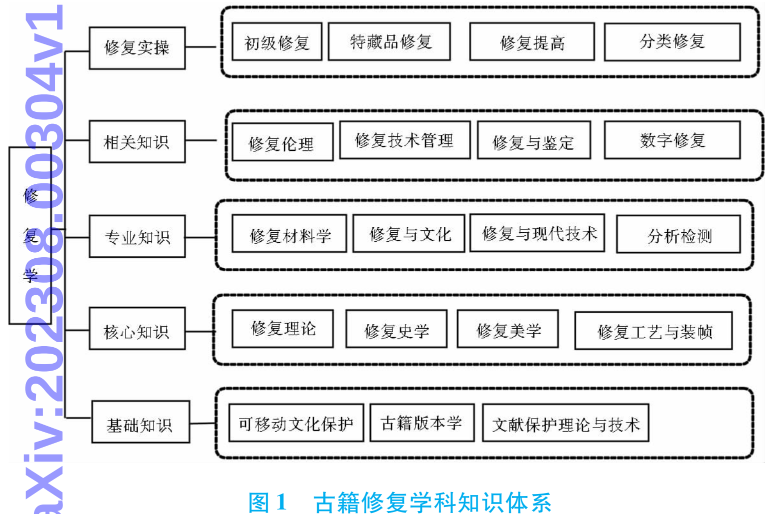


图 1　古籍修复学科知识体系

古籍修复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对于深入开展修复理论研究和科学开展工作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修复理论的研究可以揭示每一种操作所隐含的本质和机理，为合理、科学地开展修复找到依据。认识到这一点，修复理论就变成了修复工作者必须追问的具体问题，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变成了理解应修复“什么”、应该怎样“修复”的重大实践问题。

4　古籍修复学研究范式及学科建设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具备较完整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学术评价体系，能体现其研究范式，这也是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4]。中国古籍修复旗帜鲜明地以传承古代方法为主，近些年来，现代材料、方法、技术有逐步渗透，将其归纳总结大致可分为三种范式：工匠式的修复、工匠与技术组合修复、科技修复。这三种研究范式路径、方法、效果等有很大差异，在观念上也有很大分歧[5-6]。

工匠式的修复基本是手工操作，修复人员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积累丰富的经验、有一定文化修养、自身有兴趣才能胜任修复工作的开展。个人技能素养、主观判断、责任心和态度决定了能否开展修复工作和修复的效果。中国古代传承的修复基本属于此种类型，师徒相传，言传身教，师徒方法越接近说明学习越到位。

工匠与技术组合方式是开始关注古籍本身的特征和修复的意义，解决修复中主观判断不准和有误等问题。组合式较工匠式更易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引入现代技术将极大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在古籍修复前和修复中通过现代设备检测、分析，结合文献研究，找到古籍形成时的特点、组成和结构，依据破损病害特点，凭借个人手法将破损处修补好或将现在根本不存在的原件缺失处补齐。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应用对比、类比研究法，丰富特有的经验、案例分析是常见的方法。修复本身是否改变现状和原貌、改变了多少，在工匠式和组合式中主观仍起主导作用，很难客观评估。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批有良好的高等教育背景人士加入到修复行业中，这批人员有着良好的自然学科背景、坚实的人文学科基础，他们在修复中更多关注古籍原件形成时的特征、机理等背景信息，对病害原因和机理做无损或微损分析、检测，透过分析，诊断古籍破损状况和毁损程度，以便选择修复材料和修复方法。现代技术、设备和掌握现代技术的人员是开展修复工作不可缺少的，有些技术可能代替原手工操作。比如科技修复范式，在此研究范式下，古籍保护可以借助实验设备开展大量实验研究，得出大量数据，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古籍和文物修复呈现出的是鲜明的案例研究范式，他们借助修复珍贵古籍的机会，运用检测和测试设备，通过分析古籍原件成分、结构来确定修复方案和方法。

上述三种范式，各有其优缺点。考虑到中国古籍修复长期突出手工操作，工匠式占主导的特点，新技术的接受和推广要冲破传统惯性。如果将修复按学科建设考虑，则需要抛弃各种范式的缺点和限制，利用现代科技，充分发挥传统修复技艺精华，因此，第二种范式对于当下古籍修复学科建设而言较为合适。范式研究

ChinaXiv:202303.00304v1

赋予修复学科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范式需要专门理论体系为支撑,为自己规划出明确的领地和空间,内行、外行界限明确。

如何扭转"修复等同于实践活动"这一刻板印象,去除"修复工作者等同于匠人"这种标签化认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显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推动修复科学理论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内部动力,对于中国古籍修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应该如何看待、解决这种矛盾,作为矛盾的双方应该如何自处,修复实践的发展遇到许多问题,需要有系统理论指导。系统的理论必须从学科化建设中获得,作为边缘和交叉学科,需要打破传统模式的局限,从横向的角度对学科的对象进行划分,这个学科的出现,必将是对传统古籍修复的完善、补充和修正,是传统古籍修复革新的一种体现[7]。修复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准备和发展,具备了学科基本特征,有其理论体系、专门方法、研究机构、教学单位、学术团体、学术活动、专著、出版物等条件,学科建立从可能变为现实。并且随着修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学科体系建设也必然更加完善和细化,最终形成交叉、融合的独特的学科体系。

古籍修复学科建设需要借助图书馆及相关领域开展工作,需要这样的大平台把知识输向公众。当前政府与社会对古籍修复空前重视,将其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修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古籍修复属于修复学的一部分,是一个小共同体,如果将档案修复、文物修复共同考虑,则成一个大共同体[8],它们间有特殊性,更多趋向于普遍性。对于一个大共同体而言的,它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赋予共同体成员一个共同的身份。古籍修复学科建设在一个小共同体内部讨论,对于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来说,它仍然是普遍的、适用的。修复学是一新兴学科,学科的构建符合社会实践的要求,也符合科学发展的需要。古籍修复学科建设对今后构建修复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修复学作为文化遗产、博物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的增长点,建立修复学科共同体是大势所趋,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和协同配合的新平台,修复学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概念将国内与修复有关的各不同板块,包括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图书保护、档案保护、艺术与博物馆、艺术史、古代绘画整理出版等,进行了资源集成和整合,为今后建制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

chinaXiv:202308.00364v1

参考文献:

[1] 叶继元. iSchools 与学科整合[J]. 图书情报工作,2007,51(4):6-9,51.
[2] 张美芳. 中美图书档案修复高等教育的对比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 33(1):90-94.
[3] 肖希明,唐义.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课程体系整合初探[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3):4-12.
[4] 金愉,李立宏,徐桂香,等. 略论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的文献研究互动空间[J]. 中国科技信息,2012(12):202-238.
[5] 王宸君.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共同基础[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 23(3):6-7.
[6] 王子舟,姚学斌. 从公认度与生长度看图书馆学学科地位[J]. 图书与情报, 2002(4):2-6.
[7] 陈红彦. 国外古籍修复人才的科学培养对我们的启示[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75-80.
[8] MARTY P F,TWIDALE M B. Museum informatics across the curriculum: ten years of preparing LIS students for careers transcending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11,52(1):9-22.

Some Thinking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Zhang Meif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SIR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view of the facts that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on practical action, overlook on theory research, cultivate talents like craftsman, this paper construct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discipline as the internal-motivation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distinguish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ther disciplines and ancient books restoration. Then, based on the way of building for discipline, this paper tried to build knowledge system for discipline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cultivating mode of both craftsman and technology is the main pattern for discipline building, introducing modern technology can rich discipline intens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Keywords: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theo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